

# 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发展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 29 个省级城市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张仁枫

**【摘要】**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是新时代养老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促进养老事业持续发展、社会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运用定性比较分析(QCA)方法,以全国 29 个省级城市(港澳台、西藏、广西的省级城市除外)的数据为例,确定政策支持、养老服务基础设施、养老服务投资、科技因素和人才因素等五项条件变量,分析影响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发展的条件组合。研究结果显示:政策支持是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模式发展的充分条件,人才因素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养老服务投资的影响不显著。建议: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提高养老服务专业人才的能力和水平;因地制宜,选择适合本地区的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模式。

**【关键词】**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影响因素;定性比较分析;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

**【作者简介】**张仁枫,博士,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社会治理(四川 成都 610207)。

**【原文出处】**《老龄科学研究》(京),2024.6.66~7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高质量’导向下城乡社区治理和服务体系建设的有效性研究”(编号:21ZDA110)。

## 引言

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是基于卡尔·波兰尼的嵌入理论发展而来的养老服务模式,其通过整合社区及周边的养老服务资源,以资源嵌入、功能嵌入等形式,为社区范围内的老年人提供个性化、专业化和全方位的服务,集合了机构的专业服务、家庭的情感维系与社区的便利,可以更好地满足老年人的需求,成为我国养老服务发展的趋势之一。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既能满足老年人原居安养的愿望,又能利用社区周边资源为老年人提供专业、便利的服务。作为一种新型养老服务模式,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是完善我国养老服务体系、促进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

国外没有“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一词,国内学界主要从概念界定、发展现状、设施建筑、发展路径

等视角研究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就其影响因素而言,学者们从不同出发点进行了探讨。胡宏伟等(2015)基于宏观视角,认为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的发展过程实质上是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制度的完善过程,必然会受到宏观制度的影响,所以,应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促进社区与养老服务企业建立分工协作机制。周悦等(2019)以提升养老驿站嵌入能力为切入点,提出如下主张:政府宜建立全面风险管理机制,发挥监督职能;利用现代科技,搭建门户网站和信息数据库;在人才培养机制上,增设养老服务人才培养专业教育、职业教育、社会培训等培养体系。王晶等(2019)通过调研我国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养老服务现状,根据地区特征,探究政府支持、养老服务设施利用、人才队伍建设等对不同地区的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的影响。李翔(2014)将关注点放

在养老服务本身,认为政府引导、市场投入、服务水平、人才队伍建设等对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发展的影响重大。赵小兰等(2019)主张,通过精准定位和细化功能、实现跨社区连锁经营、构建邻避冲突解决机制以化解邻避困境、促进政策落地实施等,突破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发展的困境。张乐川(2020)基于动态视角探析健康中国战略背景下的关键性政策对我国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发展的影响机制。他认为,要从政策供给上规范嵌入式养老服务的制度标准和协调基本护理保险制度中的各方利益,这两个方面都非常必要而紧迫。

总的来看,当前学界关于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的研究更多的是针对特定地区的案例研究,且多为定性分析,虽有一定的深度但缺乏广度。此外,现有研究多采用基于线性因果关系的统计分析方法,对于探析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这一复杂问题存在局限性。本文拟基于已有研究的有益经验以及存在的不足,以我国部分城市的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模式为研究对象,以定性比较分析(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QCA)为研究方法,构建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发展影响因素定性比较分析的研究框架,挖掘出不同影响因素组合下的多重实现路径。在研究方法上,本文是一次有益尝试。

## 一、研究设计

### (一)研究方法

Charles C. Ragin 于 20 世纪 80 年代提出定性比较分析方法。该方法适用于分析中小数量样本的案例。经过多年发展,定性比较分析方法逐渐进入社会学、管理学等领域,为学者们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

QCA 方法以整体的案例分析为视角,在分析问题时将各条件变量视为互为影响的因素,这种设定更符合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影响因素的实际情况。此外,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结合了定性分析的逻辑性、定量分析的客观性以及外部推广性,更适合用来分析复杂的社会问题。目前,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分为

清晰集分析、模糊集分析和多值比较分析三类。本文拟利用模糊集分析(fuzzy-setsanalyse)探究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模式的影响因素与发展路径。

### (二)案例样本的选择

本文最初选择全国除港澳台之外的 31 个省份的省级城市的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组态作为研究样本,由于拉萨市和南宁市的相关数据不足,因此剔除这两个城市,最终确定 29 个省级城市为案例样本。这么做的主要原因如下:1)条件变量取自权威机构公布数据,具有可信性;2)29 个省级城市的发展阶段、发展环境各不相同,这些城市中既有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发展较好的京沪地区,也有欠发达的新疆、青海等地区,同时将这些样本组态相结合进行分析,有利于充分识别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模式的相关影响因素及其组合路径。

### (三)结果变量设计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发展状况,但目前学术界对此尚没有统一的衡量标准。基于此,本研究选择的结果变量为《中国城市养老指数蓝皮书 2017》(《中国城市养老指数蓝皮书》课题组,2017)中的样本城市养老指数。《中国城市养老指数蓝皮书 2017》是由国研智库联合北京甲子征信公司,邀请相关部委领导及行业专家,经过较长时间的实地调研与系统研究,不断充实、完善,最终形成的我国第一个反应城市养老服务状况的指数系统成果,可信度较高。本文使用该数据代表各个城市的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发展水平。

为便于分析,需要将结果变量的原始数据(即城市养老指数)进一步校准(calibrate)为模糊集的隶属度分值。因为原始数据是连续变量,因此通过软件计算来校准。在校准之前,将 0.95,0.50 和 0.05 的定性锚点设置为原始数据的 90%,50% 和 10% 的分位数,即 75.02,67.80 和 60.90(见表 1)。

### (四)解释变量设计

从对目前研究的梳理来看,国内学者关于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发展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政

表 1 社区嵌入式养老发展变量和校准锚点

变量分类	变量名称	变量观测值	数据来源	锚点		
				完全不隶属	部分隶属	完全隶属
结果变量	建设成效	城市养老指数	《中国城市养老指数蓝皮书》课题组,2017	60.90	67.80	75.02
条件变量	政策支持	样本城市是否发布了关于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的相关政策文件	民政部、各城市政府官网	2	6	10
	养老服务基础设施	(2016年各城市的社区养老床位数/当地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总数)/1000	佚名,2016	49.700	57.690	73.108
	养老服务投资因素	2016年第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额	佚名,2016	2975.90	40916.16	60280.60
	科技因素	2017年国家信息中心公布的城市信息化指数	《2017年中国信息社会发展报告》	0.600	0.680	0.762
	人才因素	(2016年各城市的卫生技术人员数量/当地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总数)/1000	佚名,2016	56.250	68.130	95.894

府政策支持、养老服务基础设施、养老服务投资、科技因素以及人才因素这五个方面。本研究基于已有文献的理论基础,对以上各因素具体说明如下。

### 1. 政府政策支持

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的发展离不开政府政策的支持和推动。第一,为使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形成连锁效应,前期必须有政府资金和物力支持。第二,在推进一项新的改革时,往往是政策先行,法律相对滞后。发挥政策制度的先导性作用,因势利导推动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发展是其中关键的一步。第三,为保证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模式的良性发展,其组织运行须有政府的引导和规范。具体而言,推动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发展的相关支持政策包括权益保障、社会优待、土地供给、建设补贴、运营补贴、床位补贴、税费减免、政府购买服务、人才培养以及贴息贷款等。本文采用截至2017年各城市养老服务政策的出台率作为政策支持指标(见表2)。

### 2. 养老服务基础设施因素

在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的发展过程中,无论是日间照料中心、老年活动室,还是康养基地,都需要有一定的配套设施及服务。施巍巍等(2015)认为,养老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对于缩小地区间的养老服务差距、实

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有着显著作用。本文选择(各城市的养老机构床位数/当地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1000作为衡量各城市的养老服务基础设施充足性指标。2016年,全国平均每千名65岁及以上老年人拥有的养老机构床位数为49.700张<sup>①</sup>。因此,将锚点0.05确定在49.700,低于49.700则完全不隶属于强养老服务基础设施集。将0.95和0.50的定性锚点设置为原始数据的90%和50%的分位数,即73.108和57.690。

### 3. 养老服务投资

养老服务投资除了能够反映某地区对养老服务的投资情况,更重要的是能够反映某地区发展养老事业的信心。胡祖铨(2015)通过测算政府负担的养老服务投资,认为政府养老服务投资对于我国养老服务业的影响较大,合理的投资分配有利于提高养老服务质量和对养老服务的补贴水平。孙涛等(2020)从养老PPP服务模式入手的研究发现,对于我国大部分城市而言,社会资本投入对于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的发展存在较大影响。养老服务业属于第三产业,因此,本研究采用第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额来衡量各城市的养老服务投资情况,将0.95,0.50和0.05的定性锚点设置为原始数据的90%,75%和50%的分位数,即6280.60,4916.16和2975.90。

表 2 我国各省级城市养老服务政策出台情况

城市	细分养老服务政策										类型总计
	权益保障	社会优待	土地供给	建设补贴	运营补贴	床位补贴	税费减免	政府购买	人才培养	贴息贷款	
北京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10
上海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10
天津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10
重庆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10
石家庄	无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9
太原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10
呼和浩特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10
沈阳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10
长春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10
哈尔滨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10
南京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10
杭州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10
合肥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10
福州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10
南昌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10
济南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10
郑州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10
武汉	有	无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9
长沙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10
广州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10
海口	有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1
成都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10
贵阳	有	有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2
昆明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10
西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10
兰州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10
银川	有	无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9
西宁	有	有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2
乌鲁木齐	有	有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2

#### 4. 科技因素

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与智慧养老相呼应,加大对科技的投入能够有效实现对养老服务信息的大数据管理,也更容易实现规模运营。贾妍等(2020)结

合计量分析的研究发现,在智慧城市建设背景下,大数据和云技术共同促进了我国养老事业的发展,对于提高养老服务质量有着重要意义。本研究的评价指标采用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2017)的

《中国区域科技创新评价报告 2016-2017》中的 2017 年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指数作为衡量各城市养老服务科技化水平的指标,并将 0.95,0.50 和 0.05 的定性锚点设置为原始数据的 90%,75% 和 50% 的分位数,即 0.762,0.680 和 0.600。

## 5. 人才因素

《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13)》指出,我国高龄、失能、慢性病老年人数量众多,并且空巢、无子女、失独老年人逐渐增多(吴玉韶,2013)。因此,我国急需培养更多的专业化养老服务人才,并通过人才的积累和高度集聚促进社区周边发展,吸引并整合更多资源。郭丽君等(2019)从宏观层面构建中国养老服务人才培养体系,并强调,培育专业的养老服务人才对于推动新时代养老服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拟采用(各城市的卫生技术人员数量/当地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总数)/1000 作为衡量各城市的养老服务人才情况的指标。2016 年,全国平均每千名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拥有的卫生技术人员为 56.250 名<sup>②</sup>,因此将锚点 0.05 确定在 56.250,低于 56.250 则完全不隶属于强养老服务人才集。将 0.95 和 0.50 的定性锚点设置为原始数据的 90% 和 50% 的分位数,即 95.894,68.130。

## 二、定性比较分析及结果

### (一) 数据校准

根据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fsQCA)的技术要求,在对变量进行分析前要进行数据校准,以反映各案例在集合中的相对位置。本文采用三值模糊校准法,设置完全隶属点 1.0、交叉隶属点 0.5 和完全不隶属点 0 三个临界点。根据已有理论和实际经验,以变量分值的均值为参考对变量进行校准,校准后的数值在 0 到 1 之间,数值越高,表示案例隶属度越高。为便于软件运算,本文将各个变量的名称进行简化处理,将政策支持( $P_{ol}$ )、养老服务基础设施( $I_{nr}$ )、养老服务投资( $I_{nv}$ )、科技因素( $T_{ec}$ )和人才因素( $H_{um}$ )作为解释变量,将养老服务指数( $R_{esult}$ )作为被解释变量,运

行后得到各变量的模糊集赋值表(见表 3)。

### (二) 单变量必要性分析

在定性比较分析中,一致性(consistency)和覆盖率(coverage)是确定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必要性和充分性关系的重要指标。一致性指标用以分析各条件变量是否是导致结果变量的必要条件。一致性得分介于 0.8 与 0.9 之间,说明条件 X 是结果 Y 的充分条件。若一致性得分大于 0.9,则将该前因变量视为结果的必要条件;反之,如果必要性一致性指标值小于 0.9,则不能将 X 看做 Y 的必要条件(Schneider et al., 2012)。覆盖率指标用以判断给定条件在多大程度上解释了结果的出现(何俊志, 2013),覆盖率指标的数值越大,说明条件 X 对结果 Y 的解释力越大。

由表 4 可知:当结果变量为高指数时,各单项条件变量均小于 0.9,说明各单项条件变量均不构成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模式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单项条件变量  $P_{ol}$ (政策支持)一致性结果介于 0.8 与 0.9 之间,说明其是推动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模式高质量发展的充分条件。当结果变量为低指数时,  $\sim T_{ec}$ (低科技因素)得分超过 0.9,说明该项条件变量是导致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模式低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  $\sim P_{ol}$ 、 $\sim I_{nv}$  的一致性得分介于 0.8 与 0.9 之间,说明弱政策支持、低养老服务投资是阻碍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充分条件。

### (三) 真值表构建

构建真值表可以确定不同因果条件组合下案例的归属情况。按照软件设定,在真值表中,将大于 0.9 的赋值记为“1”,将小于 0.9 的赋值记为“0”。将表 3 所对应的数据输入 fsQCA 软件中,删除没有案例配置的条件组合,可得到如表 5 所示的真值表结果。

### (四) 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结论

fsQCA 可以产生三种不同复杂程度的结果:复杂方案、中间方案和简单方案。三种方案除复杂性不同之外,还存在普适性上的差异。其中:复杂方案

表3 各变量的模糊集赋值表

城市	政策支持 (P <sub>ol</sub> )	养老服务基础设施 (I <sub>nf</sub> )	养老服务投资 (I <sub>nv</sub> )	科技 (T <sub>ec</sub> )	人才 (H <sub>um</sub> )	养老服务指数 (R <sub>esult</sub> )
北京	0.95	0.65	1	0.99	0.99	0.99
上海	0.95	0	0.87	0.95	0.5	0.90
广州	0.95	0.54	0.52	0.99	0.93	0.94
杭州	0.95	0.79	0.50	0.96	0.96	0.55
重庆	0.95	0.05	1	0	0	0.05
成都	0.95	0.95	0.90	0.18	0.22	0.62
天津	0.95	0	1	0.50	0.14	0.12
武汉	0.90	0.97	0.43	0.90	0.83	0.68
南京	0.95	0.27	0.13	0.81	0.74	1
济南	0.95	0	0.03	0.50	0.09	0.21
哈尔滨	0.95	0	0.04	0	0	0.02
西安	0.95	0.54	0.21	0.13	0.91	0.66
沈阳	0.95	0	0	0.13	0	0.50
长春	0.95	0	0.02	0	0	0.29
长沙	0.95	0.58	0.36	0.59	0.15	0.75
郑州	0.95	0.98	0.76	0.01	0.88	0.11
贵阳	0.05	0.26	0.03	0.01	0.53	0.03
福州	0.95	0.02	0.05	0.05	0.57	0.05
合肥	0.95	0.02	0.23	0.01	0.03	0.05
南昌	0.95	0	0.04	0.01	0	0.28
太原	0.95	0.74	0.01	0.07	0.93	0.41
石家庄	0.9	0.79	0.05	0	0.87	0.92
银川	0.9	0.50	0	0.01	0.1	0.99
昆明	0.95	0.20	0.07	0.01	0.39	0.80
乌鲁木齐	0.05	0.96	0	0	0.95	0.93
呼和浩特	0.95	0	0	0.07	0.02	0.05
海口	0.02	0.60	0	0.02	1	0.12
兰州	0.95	0.69	0.01	0.01	0.08	0.47
西宁	0.05	0.93	0	0	0.85	0.53

以所有的条件变量为分析依据,结果通常过于复杂,普适性较差;简单方案则将条件变量精简化,结论可能与实际情况不符,因此启示性较差;中间方案介于两者之间,在复杂性与普适性上都更优(李健,2012)。本文参考已有研究,采用中间方案提供的组合,最后结果如表6所示。

高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发展指数主要包括五条

路径。从表6可以看出,每条路径的一致性都高于0.850000,总的结果覆盖率为0.890110,说明组合路径具有较好的解释力。

$$R_{\text{result}} = P_{\text{ol}} * I_{\text{nf}} * \sim T_{\text{ec}} * \sim H_{\text{um}} + P_{\text{ol}} * \sim I_{\text{nv}} * T_{\text{ec}} * H_{\text{um}} + P_{\text{ol}} * I_{\text{nf}} * T_{\text{ec}} * H_{\text{um}} + P_{\text{ol}} * I_{\text{nf}} * \sim I_{\text{nv}} * \sim H_{\text{um}} + P_{\text{ol}} * I_{\text{nf}} * \sim I_{\text{nv}} * T_{\text{ec}}$$

由以上分析得出四种覆盖比例最高的组合:

表 4 单个条件变量的必要条件检测

条件变量	高指数		低指数	
	一致性	覆盖度	一致性	覆盖度
$P_{ol}$	0.881598	0.518892	0.234980	0.534425
$\sim P_{ol}$	0.208987	0.565637	0.849800	0.679537
$I_{nf}$	0.614123	0.715711	0.373832	0.465503
$\sim I_{nf}$	0.541370	0.447260	0.771696	0.681202
$I_{nv}$	0.377318	0.640436	0.330441	0.599274
$\sim I_{nv}$	0.763909	0.516393	0.801736	0.579074
$T_{ec}$	0.462910	0.820480	0.194259	0.367889
$\sim T_{ec}$	0.643367	0.427691	0.905207	0.642959
$H_{um}$	0.663338	0.680820	0.419893	0.460468
$\sim H_{um}$	0.474322	0.433507	0.708945	0.692308

表 5 真值表

$P_{ol}$	$I_{nf}$	$I_{nv}$	$T_{ec}$	$H_{um}$	案例数	$R_{result}$	raw consist	PRI consist	SYM consist
1	0	0	0	0	7	0	0.453333	0.209003	0.241636
0	1	0	0	1	3	0	0.695652	0.507042	0.603352
1	1	0	0	1	3	0	0.862464	0.712575	0.782895
1	1	1	1	1	2	1	1	1	1
1	1	0	0	0	1	1	0.911972	0.780702	0.908163
1	0	1	0	0	1	0	0.475177	0.139535	0.139535
1	1	1	0	0	1	1	0.910526	0.738461	0.979592
1	1	0	1	0	1	1	1	1	1
0	0	0	0	1	1	0	0.587302	0.170213	0.170213
1	0	0	0	1	1	0	0.814433	0.571429	0.571429
1	1	1	0	1	1	0	0.646739	0.166667	0.166667
1	0	0	1	1	1	1	1	1	1
1	1	0	1	1	1	1	1	1	1

表 6 fsQCA 软件运算结果

条件组合	原覆盖率	净覆盖率	一致性
$P_{ol} * I_{nf} * \sim T_{ec} * \sim H_{um}$	0.226106	0.034950	0.885475
$P_{ol} * \sim I_{nv} * T_{ec} * H_{um}$	0.221826	0.052782	1
$P_{ol} * I_{nf} * T_{ec} * H_{um}$	0.236805	0.061341	0.894879
$P_{ol} * I_{nf} * \sim I_{nv} * \sim H_{um}$	0.211127	0	0.922118
$P_{ol} * I_{nf} * \sim I_{nv} * T_{ec}$	0.199715	0	1
Solution consistency	0.890110		

$P_{ol} * I_{nf} * T_{ec} * H_{um}(0.236)$  = 政策支持 \* 养老服务基础设施 \* 科技因素 \* 人才因素

$P_{ol} * I_{nf} * \sim T_{ec} * \sim H_{um}(0.226)$  = 政策支持 \* 养老服务基础设施 \* 低科技因素 \* 低人才因素

$P_{ol} * \sim I_{nv} * T_{ec} * H_{um}(0.221)$  = 政策支持 \* 低养老服务投资 \* 科技因素 \* 人才因素

$P_{ol} * I_{nf} * \sim I_{nv} * \sim H_{um}(0.211)$  = 政策支持 \* 养老服务基础设施 \* 低养老服务投资 \* 低人才因素

据此,本研究发现了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建设的三种路径。

路径一: $P_{ol} * I_{nf} * T_{ec} * H_{um}$ (政策支持 \* 养老服务基础设施 \* 科技因素 \* 人才因素)。

该条件组合的含义是,无论有无养老投资,只要有政策支持、充足的养老服务基础设施配置,并激活科技要素,发挥养老服务人才的主观能动性,就可以建设高水平的社区嵌入式养老模式。这种路径主要反映了北京、上海、广州、杭州、武汉等综合实力较强城市的情况。这些城市由于有着较好的养老服务配套设施,其养老服务发展走在全国前列,并利用互联网+、云计算等现代科技手段打造智慧养老服务体系,再加上人才优势,形成了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发展的良性循环。从发展阶段上看,经济发达、科技和人才资源较为丰富的区域可以采取这种路径,通过发挥先天优势持续领跑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发展。

路径二: $P_{ol} * I_{nf} * \sim T_{ec} * \sim H_{um}$ (政策支持 \* 养老服务基础设施 \* 低科技因素 \* 低人才因素); $P_{ol} * I_{nf} * \sim I_{nv} * \sim H_{um}$ (政策支持 \* 养老服务基础设施 \* 低养老服务投资 \* 低人才因素)。

这两个组合的核心条件一致,可以归类于同一种类型。这说明,即使没有较高的科技水平、丰富的人才资源以及足够的养老投资,当一个城市有政策支持和完备的养老服务基础设施时,也可以促进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的发展。其主要代表城市为银

川、兰州。这类城市并不具备充足的科技、人才因素,也难以吸引足够的养老投资,但是在当地政府的政策支持下,通过保证充足的养老服务基础设施供给,也可以打造很好的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从发展阶段上看,信息化不发达、人才流出严重、经济较为落后的区域宜采用这种发展路径,以减少其所面临的经济、信息化发展滞后对于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发展的阻力。

路径三: $P_{ol} * \sim I_{nv} * T_{ec} * H_{um}$ (政策支持 \* 低养老服务投资 \* 科技因素 \* 人才因素)。

这一组合表明,有些城市虽然养老服务投资水平低,但在政策支持下,再加上科技和人才资源的加持,也能实现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的高水平发展。石家庄、西安是这类模式的主要代表。当一个城市的老年人口较多但养老服务基础设施供给不足时,可以选择这条路径,凭借科技资源优势,推出“虚拟养老院”等线上养老服务模式,并大力培养和吸引养老服务相关专业人才,以充分满足市场需求。

### 三、结论与建议

#### (一) 结论

通过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对全国29个省级城市(港澳台,西藏、广西的省级城市除外)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发展状况进行分析,本文结论如下。

1. 政府政策支持是推动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发展的关键因素

综上所述,政府政策支持因素出现在所有变量条件组合中,属于重要变量。该结论与目前大多数学者的研究结论一致。由于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模式的发展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因此,只有基于税收优惠、财政支持以及建立专门机构指导运营等政策支持,才能更好地推动其发展。此外,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作为一种新型养老服务模式,也需要政府重

视对居民相关意识的宣导,引导社区、社会组织、企业等自愿联合。因此,各城市普遍出台了相应的政策文件,完善顶层设计,以推动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模式获得较好发展。

2. 养老服务人才是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发展的重要前提

人才因素也出现在多个变量条件组合中,在推动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模式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老年人口数量大,且老年人患慢性病的概率以及失能风险较大,所以必须保证充足的护理人才。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作为新型养老服务模式,主要是为社区辐射范围内的老年人提供高质量的养老服务。养老服务专业人才是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发展的重要前提。

3. 养老服务投资对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发展的影响并不显著

养老服务投资因素对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发展的影响较小。对于传统的养老院、日间照料中心而言,养老服务投资水平高低关系到其发展好坏;但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模式本身带有天然的整合凝聚功能,可以通过合理利用周边资源实现对养老服务模式的创新,因此,其对养老服务投资的依赖度较小。

但以上情况并不绝对,因为从我国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发展的轨迹来看,养老服务投资在其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模式始于经济发达城市,一般而言,经济发达城市吸引的养老服务投资也较多。本研究由于在样本选取和变量处理上带有主观性,因此在结果上也会产生一定的误差。但本文的研究结果也印证了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经济社会过程,是多种因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因此,不能将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的发展快慢简单归因于某一因素,在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的实际发展过程中,要因地制宜,选择适合当地发

展的社区嵌入式养老模式。

## (二) 政策建议

鉴于上述结论,结合我国国情和相关实践,本文对于推动我国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发展提出如下建议。

### 1. 加强政策支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养老事业关系人民幸福和社会稳定,所以对其必须加强政府政策层面的支持和引导。从实际情况来看,目前我国在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的土地供给、床位补贴、税费减免等方面已有相关政策出台,未来宜在目前基础上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例如,制定有针对性的《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法》,明确界定政府、社区、社会组织、家庭等主体在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体系中的责任与义务,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模式的性质和定位、资金来源、运营管理,以保障老年人在养老、医疗、人身安全等方面的合法权益。

### 2. 突破人才瓶颈,加快专业人才培养

目前看来,我国不仅养老服务人才短缺,而且存在服务人员年龄老化、流动性大、服务技能差、文化程度低、专业知识薄弱等问题。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口为4063万人,占老年人口总数的18.3%(韩家慧,2017)。按照《养老机构管理办法》,养老护理人员与服务对象的配备比例依据服务对象的健康状况不同而有所不同,全护理的配备比例不低于1:3(张盈华等,2015)。据此计算,全国约需要1300万名养老护理员(郭丽君等,2019)。然而,2019年,全国卫生技术人员844万人,其中专业护理人员仅为380万人,养老服务人员缺口巨大。与此同时,老年心理学、法律咨询、长期护理等方面的专业人才缺乏,老年人的多元化服务需求难以满足。专业的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是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模式发挥作用的重要保障,所以,必须重视该领域的人才队伍建设,不断提高养老服务人员的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

### 3. 因地制宜,选择适宜本地区的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发展模式

通过采用模糊比较分析法可知,促进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发展存在多种路径组合。养老服务基础设施较好但科技化水平不高的城市,宜着力推进养老服务实业发展,将主要精力投入提高养老服务设施的使用效率上。科技化水平较高、人力资源丰富但养老服务基础设施欠佳的城市,可以利用其信息化优势发展智慧养老服务,促进养老服务的提质增效。

需要说明的是: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发展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本文由于在研究过程中难以纳入所有影响其发展的因素,因此研究结论可能存在一定的偏差;此外,虽然本研究在模糊集校准的过程中参考了已有理论和实际经验,并以变量分值的均值为参考来确定校准锚点,符合一般研究要求,但也可能存在更为合理的校准方式。以上不足均有待后续研究来弥补和完善。

#### 注释:

①②根据2016年29个省级城市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计算而来。

#### 参考文献:

[1]郭丽君,鲍勇,黄春玉,等,2019.中国养老人才队伍培养体系[J].中国老年学杂志(14):3576-3581.

[2]何俊志,2013.比较政治分析中的模糊集方法[J].社会科学(5):30-38.

[3]贾妍,蓝志勇,刘润泽,2020.精准养老:大数据驱动的新型养老模式[J].公共管理学报(2):95-103,171.

[4]韩家慧,2017.民政部发布《2016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EB/OL].(2017-08-03)[2024-04-29].[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7-08/03/c\\_129672055.htm](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7-08/03/c_129672055.htm).

[5]胡宏伟,汪钰,王晓俊,等,2015.“嵌入式”养老模式现状、评估与改进路径[J].社会保障研究(2):10-17.

[6]胡祖铨,2015.养老服务业领域政府投资规模研究[J].宏观经济管理(3):46-48.

[7]李健,2012.规制俘获理论跨学科研究进展述评[J].经济评论(1):153-160.

[8]李翔,2014.社会嵌入理论视角下城市社区居家养老问题研究[J].广西社会科学(4):131-134.

[9]施巍巍,唐德龙,2015.欠发达地区破解养老服务之困的路径选择与创新[J].中国行政管理(4):94-98.

[10]孙涛,谢东明,赵志荣,2020.养老PPP的服务模式与融资结构研究[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167-178,223.

[11]王晶,李鹏飞,2019.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模式的优势与思考:基于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养老服务现状的考察[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6):133-139,222.

[12]吴玉韶,2013.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13)[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3]佚名,2016.2016年各省区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汇总[EB/OL].(2017-02-24)[2024-04-29].[http://district.ce.cn/zg/201702/24/t20170224\\_20510455.shtml](http://district.ce.cn/zg/201702/24/t20170224_20510455.shtml).

[14]张乐川,2020.健康中国战略背景下嵌入式养老的功能定位、模式选择与保障政策分析[J].东岳论丛(4):71-77.

[15]张盈华,闫江,2015.中国养老服务现状、问题与公共政策选择[J].当代经济管理(1):51-56.

[16]赵小兰,孟艳春,2019.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模式:优势、困境与出路[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4):89-95.

[17]《中国城市养老指数蓝皮书》课题组,2017.中国城市养老指数蓝皮书2017[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

[18]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2017.中国区域科技创新评价报告2016-2017[M].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19]周悦,崔炜,2019.北京市嵌入式养老模式发展研究:以养老服务驿站为例[J].新视野(4):90-96.

[20]SCHNEIDER C Q, WAGEMANN C, 2012. Set-theoretic methods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A guide to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55-58.